

闲话

主编 / 臧杰

青岛出版社



倾城之恋

罗家伦及其《新潮》

胡政之：荷戟也彷徨

周瘦鹃和《紫罗兰》

《晶报》的「脚编辑」余

舒新城的「倾城之恋」

林徽因徐志摩的英伦之恋

陈抱一与关紫兰的艺术缘

齐白石读书生涯

成为「上官云珠」

白薇与蓝苹

高尔基缘何替托尔斯泰夫人

法国的「钻石项链」事件

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的中国路

张若谷的一些往事

胡风的第二种忠诚

迷离失踪的费汎



闲话

· 臧杰·主编 青岛出版社

闲话文丛



倾城之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闲话(14) 倾城之恋 臧杰主编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1.11

ISBN 978-7-5436-7843-9

I. ①闲… II. ①臧…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1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5798号

- 书 名 闲话(十四) 倾城之恋
主 编 臧 杰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[http:// www.qdpub.com](http://www.qdpub.com)
责任编辑 金 龙
特约编辑 贺中原 单蓓蓓
封面设计 乔 峰
平面制作 墨点平面设计工作室
制 版 青岛人印人数码输出有限公司
印 刷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24开(889mm×1194mm)
印 张 10.25
字 数 210千
书 号 ISBN 978-7-5436-7843-9
定 价 25.0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(0532) 68068670

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印刷物资处调换。

电话: (0532) 68068629

闲话

目
录

倾城之恋○

- 罗家伦及其《新潮》 / 范 泓.....1
- 胡政之：荷载也彷徨 / 张功臣.....24
- 周瘦鹃和《紫罗兰》 / 姚一鸣.....55
- 《晶报》的“脚编辑”余大雄 / 蔡登山.....61
- 舒新城的“倾城之恋” / 彭林祥.....71
- 林徽因徐志摩的英伦之恋 / 梦之仪.....82
- 陈抱一与关紫兰的艺术缘 / 陈 钰.....93
- 齐白石读书生涯 / 谷雨.....100

闲话

目 录

- 成为“上官云珠” / 张 华.....114
 白薇与蓝苹 / 散 木.....126
- 高尔基缘何替托尔斯泰夫人辩护 / 杨建民.....148
 法国的“钻石项链”事件 / 余凤高.....156
 德国建筑师罗克格的中国路 / 王 栋.....176
- 张若谷的一些往事 / 周允中.....186
 胡风的第二种忠诚 / 孙德喜.....194
 迷离失踪的费巩 / 陈正茂.....206
- 政治“污点”·文学追求·革命激情——解读丁玲 / 魏邦良.....213

罗家伦及其《新潮》

范 泓

—

1926年6月18日，罗家伦（字志希）从马赛港搭乘法国邮船公司的 General Metzinger 动身返国，结束了六年之久的欧美各国“游学”之旅，这一年正好三十岁。临行前，由于没有路费，向友人求助，却每每遭遇“有心无力之境”，只好再次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老板张元济（菊生）私人贷款六百元，并谓“此款为纯粹个人债务，由伦于回国后一年以内还清”^①。罗家伦等人在欧美留学期间，即从1924年起，由中国棉业大王穆藕初先生资助留学基金，后因华商纱厂衰落而中断。罗家伦彼时正在德国柏林大学历史研究所攻读，面对突如其来的资金短缺，不得不向蒋梦麟及二三知交告急，“然彼等经济状况亦不佳”，似无能为力。在这种窘困之下，罗将《科学与玄学》书稿修改完毕，寄回国内出版，以期作缓解之用。北大校长蔡元培获悉这一情况后，即与老友张元济商议，为其筹措留学费用以及归国川资（即盘缠），以助罗家伦完成留学计划。张很快答应了，甚至萌生让罗家伦归国后即入



商务印书馆充任其编译之念，“藉以考察其性情、行为”。蔡立即将此事函告罗家伦，在信中却未提及资助者为何人？罗家伦是那种不愿无故受惠之人，故在给蔡的复信

○ 民国二十三年（1934年）罗家伦与家人侍父传珍公合影。右三为罗家伦，手中婴儿即罗久芳，右二为罗夫人

中，除表示感谢之外，同时希望此项资助不含有“政治或任何其他关系”：

承询经济状况，自去夏接济断绝后，当然极坏。年底以拙著《科学与玄学》寄商务，承友人见助，得垫款数百元，聊维旦夕。来函谓先生有友人愿助归国川资，盛情极可感。虽馈饷之赠，不见却于邹孟，然于心终有不安。伦意此君既有如此好意，伦有一计划，累彼似觉较浅，不知先生以为前途可以助我贯彻否？伦近年来皆系致力于研究西洋文化史及历史哲学，思他日得此借鉴，为中国在此类工作上略有建设。颇思在英国一学期（自四月中至七月底），从伦敦或剑桥一二教授游，再在法国留学三个月，于十月间回国（近已读法文参考书颇多，并治拉丁，为读西洋古籍预备。）……不知前途肯否？望婉商之。如能办到，此款不必一期寄出。……伦之所以取此办法者，（一）因不欲无故累人而受人之惠，（二）因欲于归国以前多学一点东西，于时间及经济较合算，他日虽亦有重出之机会，然此款数目尚不够或仅够来往旅费也。再者此款虽系借款，但希望无政治或任何其他种关系，在借贷方面，亦纯以为社会或国家辅助一人材（僭称）求学为宗旨。因他日为国家及社会尽力之方面甚多，欲持纯洁之身，不欲对于任何方面有何约束也。^②

倾城之恋 ○

罗家伦及其
《新潮》 ○

虽然已获助归国川资，此时的罗家伦却并不想立即返国，而是意欲前往英国和法国继续游学，以搜集中国近代史材料（法国国家图书

馆)，大约需要费用一千五百元左右。罗家伦遂在信中提出让蔡元培先生的这位朋友“设法借给”，并说，如果此项计划可行，“则任何利率，皆可承认”，回国后三年还清；或以两种书稿作为其抵押，此即他本人所译的《思想自由史》和正在翻译中的《教育思想史》。他甚至推想这两本书稿若以五元一千字计，三十余万字可售一千五百元以上，足以还清这一笔借贷。

以上说的“前途”，乃旧时人们洽谈事项时，对有关对方的一种代称。罗家伦并不知道蔡元培的这位朋友就是商务老板张元济，故有“无政治或任何其他种关系”一说。显然，成名颇早的罗家伦，十分在乎自己的“区区名誉”（罗自语）。张元济得知后，即致函蔡元培，“罗君既有怀疑，不妨先以鄙意告之。然此却非公司之款，并非丝毫约束也”^③。从上述史料看，罗家伦回国前两年的欧洲求学之旅，主要得益于蔡元培和张元济的支持与襄助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此时罗家伦对政治或做官似无兴趣，他的初步设想是回国后筹建一个专门机构，收藏、编辑、出版各种文字中有关中国近百年史料，同时展开深入研究工作；其个人则想以“科学的方法”撰写一部科学的历史，“使中国人从事实里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什么世界”……^④

在海上漂泊了一个多月，罗家伦于7月23日抵达上海。此间，旧同学卢晋侯（锡荣）设宴为其洗尘，并邀请大名鼎鼎的丁文江前来作陪。不料，比丁小十岁的罗家伦，竟冷眼以待，令其场面十分尴尬。后有人这样复述此事：“罗志希先生久已心仪丁文江其人，但是他没有想到丁文江竟会投到北洋军阀，‘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’孙传芳的麾下，在上海做起大官来了。他形容他们那一次的初相见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‘我于席上和在君（丁文江的号）见面。那时候他是淞沪商埠的总办，督办是孙传芳。我是反孙传芳的人，所以不便交谈’。道不同不相与谋，连交谈都不屑……”^⑤

这时正是中国政坛各种政治、军事势力集团相互倾轧、争斗剧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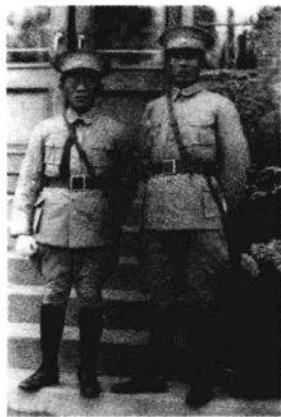
的纷乱时刻：这一年1月，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（在广州），左派势力占了上风，李大钊、林伯渠、恽代英、吴玉章等中共人士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，此次会议对“西山会议派”人士采取了严厉措施^⑥；2月，“双溪老人”许世英辞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职，贾德辉任代总理，两个月后即下台；3月，北京发生流血事件，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、赵世炎、陈乔年等人直接发动并领导的一次抗议活动，遭至段祺瑞执政府武力驱散，结果造成四十七人死亡、二百多人受伤，此即历史上著名的“三·一八惨案”；接着，“中山舰事件”、汪精卫辞国民政府主席职、谭延闿上台等历史事件相继发生；5月，外交宿将颜惠庆走马亮相，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，一个多月后即辞职，曾任海军总长的杜锡珪代理阁揆，三个月后又走人；7月1日，国民党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，几天之后，蒋介石就职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，兵分三路，从广东誓师出发，北伐之战开始……可以说，罗家伦回国之际正值天下大乱，他从内心反对孙传芳这样的军阀，自然对国民革命抱以一番憧憬，并对自己六年的“游学”经历相当满意，他这样说：“我们不曾固定的在任何一间大学里作过长达一年的停留，依照我们预定的计划，我们几乎访遍了欧洲所有著名的学府，也曾向许许多多大师级的学者当面请益。”^⑦

归国后的罗家伦，最大的心愿是想回母校北大教书。我们从其长女罗久芳教授（美国）的文章中可以知道，由于时局混乱已极，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（高梦旦语，给胡适信），兵祸党狱，人心惶惶，“归国留学生更深感报国无门，罗氏回北大教书的宿愿落空，要求清华国学研究所及厦门大学资助搜集史料的事无果”^⑧，最后决定受聘于南京东南大学历史系，其中开设的“中国近代史”课程，为我国大学在此领域中之始。当时厦门大学也邀其前往任教，罗家伦则“以东南大学邻近上海，可常向东方图书馆及亚洲文会借书为由，选择了东南大学”^⑨。

不久战事逼近南京，学校停课。罗家伦离开南京，自上海至南昌省亲。南昌一度被国民革命军攻克，不久复被孙传芳部夺回，但始终处于北伐军的包围之中。10月11日，罗家伦在家中遭遇兵劫，“除损失不赀外，先生身受六处刀伤”，虽不特别严重，然内心之震惊则溢于言表，他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这样写道：“以绝对无抵抗而遭此，难哉其为中华民国国民也！一切令人悲愤万态。以十余年作有意识之力学，设竟死于此，心何以甘！”^⑩此事亦引起友人的关切，喜欢“辩伪疑古”的北大同学顾颉刚时在厦门大学任教，他在一封信中竟称“斯人如死，如中国近代史何”^⑪云云。

这一年11月，蒋介石驻节南昌，罗与之第一次见面。此时全国的大学都已停办^⑫，罗家伦深感“以后无日不在惨雾愁云之中”。

1927年2月中旬，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三次会议在武汉举行。罗家伦随谭延闿、陈果夫、丁惟汾等人来到了武汉。罗与时任国民党中央宣部长顾孟余私交不错，顾有意让他在宣传部负责一些实际工作，但到了武汉之后，罗家伦发现与顾孟余在政治上志趣不投，即改变了主意，未同意留下。约十天后，他独自离开了武汉。行前，陈果夫交一密函，委请他转交给时在江西九江督战的蒋介石。就是这一封密函，有意无意地让罗家伦与蒋介石再一次见面。3月21日，罗、蒋二人在安庆长谈许久^⑬，次日又见一次，第三天，与蒋在“楚同舰”上又说了几句，“一席谈话之后，他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国民党北伐的队伍，担任起编辑委员会委员长、参议、及法制委员等职务。没有想到那次的对话，竟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。南京政府成立后，他受任中央党务学校教务副主任，主持筹办一个新式干部的训练场所，随后又代理校务会议主席”^⑭。



● 民国十六年（1927年），罗家伦任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时与同僚合影

台湾学者刘维开先生编著《罗家伦先生年谱》(初版,后有增补,未及见),对罗于何时加入国民党语焉不详,想必应当是在这个时候。由于罗家伦十分憎恶国内军阀割据的局面,因此,他对北伐寄予了莫大的希望,否则不会轻易改变其“素志”而投效国民革命军,所谓形势比人强是也。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辑委员会,其级别甚高。罗作为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,被授衔少将。应当说,国民革命军北伐给当时四分五裂的中国带来一线转机,即若要使中国近代化,非得铲除割据的军阀,完成统一工作、实行三民主义不可(胡适语)。这为当时全国民意之所归,甚至代表了大多数读书人的看法。

其时胡适先生正在欧洲,不时关注国内的动态,多少已改变了先前对北京政府的同情态度。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沈刚伯这时也留学英伦,专攻英国史与宪政史。有一天,沈刚伯去看望胡适,当问及国民革命军之北伐,胡适这样回答:他本来是反对武力革命和一党专政的,但革命一旦爆发,便要助其早日完成,这样才能减少战争,从事建设,“目前中国所急需的是一个近代化的政府,国民党总比北洋军阀有现代知识,只要他们真正实行三民主义,便可利于国,一般知识分子是应该加以支持的”^⑤。不独如此,胡适的学生顾颉刚也说:“自北伐军到了福建,使我认识了几位军官,看见了许多印刷品,加入了几次宴会,我深感到国民党是一个有主义、有组织的政党,而国民党的主义是切中于救中国的。又感到这一次的革命确比辛亥革命不同,辛亥革命是上级社会的革命,这一次是民众的革命……”^⑥

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空下,海归学人罗家伦或许意识到此时“革命”的重要性,决定不再一味埋首于学术研究,而是投身于忧患之中,开始了自己的从政生涯。关于这一点,即使站在今天的角度看,一个有着深厚“五四情结”的年轻人,在“革命”所造成的剧烈震荡之中,抱有一定的政治理想与热情,“脱下洋装而投笔从戎”,说它是生命中的一次激情选择也好,囿于形势的无奈也罢,罗家伦毕竟

作出了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一个选择；尽管这种选择，在日后常使他深感“迭味炎凉”，或“在政治方面，我是特立独行的”，折射出当时读书人生处乱世、效力投艰的真实心态。其实，不独罗家伦如此，“许多与北大有关系人士，包括胡适的同事蔡元培、蒋梦麟、王世杰，和他的学生周炳琳、段锡朋……，都先后加入了南京政府文教、政法方面的工作”^⑦，好友朱家骅不久也离开中山大学，前往杭州就任民政厅长。然而，在这些从政学人的行为背后，无不隐含着其个人经历的潜移默化与深刻影响，这不仅是逻辑上的一种推演，而是在对其诸多人生细节解读之后，所获得的一个必然印象。

二

罗家伦一生中的“革命”基因，乃至济世救国的抱负，最早可追溯到十二岁那年。在父亲传珍（字沛卿，又字钝庵）公的有心开导下，夜读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，实为少年仰慕“革命”之始。从罗后来在文章中可以证实：

某晚公归，于袖中出邹容《革命军》一书示余，余读之狂喜，革命思想遂以勃兴。^⑧

彼时是民前四年，即清帝光绪及慈禧太后相继死亡那年。若说有什么“革命之心”，自是对夕阳残照之下的清王朝之不满与愤激。罗的父亲此时身任江西抚署军政参事，开明之至，让一个十二岁的少年夜读禁书，无异于在单纯而又萌动中的心灵，播下一粒待来春而发的种子。严格地讲，罗的父亲是一位保守又具有进步倾向的人，其一生推崇宋明理学，“于宋兼涉朱、陆，于明则酷好阳明，并推重明季浙东诸子，如刘宗周、黄宗羲等之著述”，更是常以《王阳明集》和刘宗周《人谱》两书示子，尤其嘱咐罗家伦要熟读黄宗羲的《明夷待访录》。罗家伦擅作旧体诗，曾以七言记其事：“大袖藏归《革命军》，教儿



读罢气如云。乡贤历历频频数，惟读王刘不朽文。”

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，罗的父亲目睹了清王朝的顷刻覆灭，

从内心同情革命，“曾协助党人李烈钧等脱险”。也就在这一年，十五岁的罗家伦入美国传教士F.C.Gale创办的英文夜校苦读外语，说起来，受当时新潮之影响，却也是目光颇为远大的传珍公“苦心孤诣”的一种安排。这位“诚笃勤敏”的浙江人，工书画且精篆刻，如此一笔一刀地“形塑”一个少年学子的未来，无不浸透着为人之父的深谋远虑。

1914年，罗家伦至上海复旦公学就读。这是一所西式的学校，因其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，故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孙中山曾任校董会主席。“复旦尚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言论自由的精神。因此复旦学生的政治兴趣比其它学校的学生来得浓厚”¹⁹。在求学期间，罗与宋教仁长子宋振吕、黄季陆（后曾任四川大学校长）、吴南轩（后曾任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校长）为同窗好友，与黄兴、戴季陶等人均有过交往。这时罗家伦只是二十岁的年轻人，而黄、戴二人在此时的中国早已声名大震。罗家伦与这些人的实际接触，足以显见其在政治上的某种倾向。罗家伦参与编辑《复旦》季刊，曾撰《二十世纪中国之新学生》一文引起反响，沪上报纸且有转载；他也是最早获悉黄兴病危不治这消息的人之一。

1916年10月深秋，当他伫立黄兴的床前，向这位早逝的革命前辈默哀致敬时，不禁“心中酸痛，热泪如麻”²⁰……这些看起来颇有点



○ 罗家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，与同事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叶企孙、潘光旦、罗家伦、梅贻琦、冯友兰、朱自清；后排左二浦薛凤、左三陈位孙、左四顾毓琇

倾城之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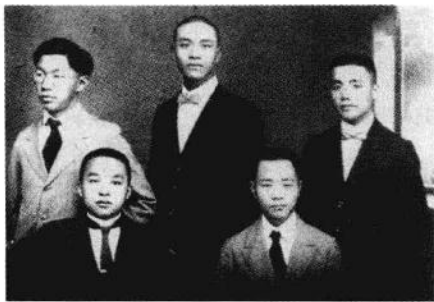
罗家伦及其
《新潮》

“新旧参半”的如烟往事，却始终影响着罗家伦青少年时代精神上的成长。其中最为生动的一点，就是罗家伦日后在北大《新潮》岁月以及五四运动中的惊人表现，似可印证当年他对“革命”之向往的真实心情。也就是说，十年前在狂喜之中捧读邹容的《革命军》，到后来不期然地写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名篇《五四宣言》，两者之间，似有一种血脉般的内在关联。“在1917年进入北大很久以前，罗家伦就受益于上一代人在国外常常杂乱无章地寻求的近代教育”^②，在知识上得以拓展视野，在思想上崭获新观念，在政治上对国民革命抱有好感，在行为上则承续了一种“自由精神”，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认为的那样：这种自由精神是近代中国三代知识分子积累的最大成果，它并非只属于学生，而是由推翻帝制官僚政治的最初斗志传递给他们的^③。而在进入北大不久，罗家伦与傅斯年、康白情等人创办《新潮》杂志，激越的社会革命主张与实践，不仅包括倡导新文化运动，而且坚决反军阀、反侵略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“新潮社的人员便与五四运动的发生，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。而罗先生在这一运动中，亦可说是居于推动的重要角色”^④。

三

1917年秋，二十一岁的罗家伦考入北大，主修外国文学。

自1916年底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，“对中西文化，取融会贯通的态度，主张学术研究自由，延揽各方学者前往任教，使学风为之丕变，成为学术界的标杆”。在蔡元培看来，大学的宗旨是不抱任何功利主义去研究学问，大学生则应充当混乱社会的“卓绝之士”。入学第一学期，罗家伦即向最具前卫性的《新青年》投稿，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，常跨系选课，并时常到胡适先生家中请益，成为胡适忠实的追随者。1918年6月，《新青年》第4卷第6期“易卜生专号”刊有罗家



伦与胡适合译的易卜生名著《娜拉》，“这一期专号出刊起到了为新文学运动推波助澜的作用”²⁸。

作为北大的优秀青年学子，罗家伦、傅斯年、顾颉刚、徐彦之（子俊）、潘家洵

○ 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，罗家伦与北大同学赴美留学前合影，前排左起：康白情、汪敬熙；后排左起：罗家伦、段锡朋、周炳琳

（介泉）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，他们在谈及北大的未来时，信心十足，并抱以诸多希望，认为“应该办几种杂志：因为学生必须有自动的生活，亦有组织的事件，然后所学所想，不至枉费了；而且办杂志是最有趣味，最于学业有补的事，最有益的自动生活”（傅斯年语）。于是，1918年初秋，创办《新潮》杂志被提上议事日程，但又因没有一个具体计划，延宕了不少时日。至同年11月19日召开第二次会议时，北大“新潮社”才算正式成立。依照当时“简章”的第五条，分设编辑部和干事部，前者总揽编辑业务，后者主持编辑以外的事务性工作。编辑部主任为傅斯年，编辑为罗家伦，书记是杨振声；干事部主任是徐彦之，干事为康白情，书记是俞平伯。顾问是胡适先生。“新潮社”设在北大图书馆红楼办公室右侧的一个房间里。

倾城之恋

北大学生组织社团，创办刊物，除了探讨学术的爱好和救国启蒙的热情外，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为日后踏入社会做好应有的准备。1919年1月1日，《新潮》杂志正式创刊。杂志的中文名称出自罗家伦的建议，以“批评的精神，科学的文义，革新的文词”为标帜。发行者为北京大学出版部，此事得到校长蔡元培的支持，批准每月从北大的经费中拨两千元作为筹办经费。

罗家伦及其
《新潮》

《新潮》大部分社员为当时北大学生，也有一两位新潮教授加入。这些人的专长一般不出哲学、文学和历史，其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具有“新”的色彩：以倡导新学，迎接新潮，刷新思想，反思传统。傅

斯年在《新潮之回顾与前瞻》一文中说过：“我们的杂志是由觉悟而结合的，至于将来，若不死于非命，我敢担保必定放个光彩。”罗家伦也提及当时的年轻人对《新潮》的关注，并不亚于对《新青年》的关注，他说：“我们天天与新青年主持者相接触，自然彼此间都有思想的交流和相互影响。



不过，从当时的一般人看来，仿佛新潮的来势更猛一点，引起青年人的同情更多一点。新潮的第一卷第一期，复印到三版，销到一万三千多册，以后也常在一万五千册左右，则声势不可谓不浩大。”《新潮》杂志六十六位作者中（一至三卷，三卷仅出了两号），傅斯年发表文章最多，有四十四篇，其次就是罗家伦，共有三十六篇。罗家伦的文章大抵有四类，论文、评论、诗歌、通信，有时署名“志希”。

这本杂志只有一百五十页，创刊号各栏文章共二十一篇，傅、罗二人写了十四篇，占“创刊号”总篇幅的十分之七之多，其中有关介绍《新潮》杂志宗旨一文《今日之世界新潮》出自罗家伦的手笔。创刊号即引起很大反响，“第一期至第五期的总编辑是傅斯年，编辑是罗家伦，两人具有很好的国学基础，又正年轻气盛，因而在编辑方面大刀阔斧，撰写文章下笔千言，不留情面，使杂志的形象新颖生动，也为白话文创作树立了良好的模式”（罗久芳语）。照最初设想，《新潮》拟每年刊发十期，第五期为一卷，每卷终了时即进行职员的选择。但到了第五号于1919年5月1日出版后，五四运动爆发，新潮社的骨干人物均忙于运动，导致第二卷第一号延至同年10月才出版，第二号也延至同年12月。其间，傅斯年于这一年秋天赴英国留学。在新潮社成立一周年的会议上，决定将原来的编辑、干事两部改设编辑一人，经理一人，由罗家伦出任主任编辑一职。第二卷第一号罗家伦一个人就写了七篇文章，第二卷第二号罗家伦又写了一篇论文、一篇演讲记录、两篇评论、一篇书评和两通复信，包括不少对当时学术界及一般社会弊病

抨击的文字。李云汉在台湾《传记文学》上撰文说：“这真是件苦事，志希先生担任这项苦差事达一年以上，直至民国九年秋赴美研究，才把新潮的编辑工作交给了新任的主任编辑周作人，新潮的光芒也开始暗淡起来了。”

四

一般认为，罗家伦对北大《新潮》杂志的贡献不可低估。他拥护新文化运动，主张用西方进步思想来改革中国的文化和社会。1919年“五四”那天，所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——《北京学界全体宣言》的传单^②，即出自这位北大三年级学生之手，这篇仅一百八十字的宣言，被后人认为“写得大气磅礴，字字铿锵，极富号召力”^③，《罗家伦先生年谱》则强调“这篇宣言用了生动、简洁的白话文，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，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”^④，这也是罗家伦“为学生界所周知和推重之始”^⑤。罗晚年曾与北美学者周策纵回忆当年情形，言及这篇宣言时，说“好像面临紧急事件，心情万分紧张，但注意力却非常集中，虽然社里（指《新潮》杂志社，作者注）的人来来往往，很是嘈杂，却好像完全没有留意，写成后也没修改过”^⑥。

罗家伦对这种亢奋的“革命激情”一直津津乐道（多次撰文谈及这场运动），1919年5月26日（“五四”三周后），以“毅”为笔名在《每周评论》第二十三期上撰文分析过这场运动的“三种真精神”^⑦，并首创“五四运动”一词，为官方及各派史家一直延用于今。以周策纵的研究，五四运动中的“新潮”主要领导人所主张的社会革命观念显然部分地受到俄国“十月革命”的影响，他指出：“在创刊号里，罗家伦论及当代世界的潮流，他说，在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时期，几乎都有它阻挡不住的潮流。……根据罗家伦的看法，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潮流就是俄国的十月革命：‘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！以前的革命是

